

内部分歧与外部质疑： 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论争

袁 方

内容提要：英国文化唯物主义自问世起，就遭到各方的质疑。有些来自内部，有些来自外部。20世纪90年代前后，文化唯物主义派内主将凯瑟琳·贝尔西转而反对自己曾经拥护的批评方法，痛批文化唯物主义，提出一种新的理论——“文化历史”。与此同时，另外两场论战也在进行，自由人文主义者理查德·列文在著名文学杂志《新文学史》上撰文批判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也指责文化唯物主义。针对以上批评，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纷纷回应。从这些内部分歧与外部的质疑开始，文化唯物主义自身也面临着巨大的转折，盛气不复往昔。

关键词：文化唯物主义；立场；分歧；转折

作者简介：袁方，文学博士，北京邮电大学人文学院讲师，主要从事20世纪西方批评理论和莎士比亚研究。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后期资助项目“文化唯物主义与英国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19FWWB003）的阶段性成果。

20世纪70年代末，以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Margaret Thatcher）为首的保守党上台执政，在政治、经济、文化等领域多管齐下，极力压制左翼力量的发展。英国新左派知识分子乔纳森·多利莫尔（Jonathan Dollimore）和艾伦·辛菲尔德（Alan Sinfield）等人不满这些做法，决定在文学批评中批判社会不公，揭示右翼势力的真实面目。1985年，二人合编的论文集《政治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新论》（*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出版，正式打出了文化唯物主义旗号。他们在序言中声称，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就是“历史语境、理论框架、政治参与和文本分析”的结合（Dollimore et al, 1985）^{viii}。

文化唯物主义将莎士比亚及其同时代的文本作为批评的对象，揭示作者如何受到当时主导意识形态的影响；同时，还在文本中寻找颠覆主流文本的证据，从而为非主导意识形态或者边缘力量提供了抵制和反抗权威的依据。这种极具批

判性的文化政治批评得到了许多知识分子的青睐，论文集出版之后，批评家们积极响应，纷纷利用文化唯物主义的方法批判经典作品中的意识形态，以古论今，针砭时弊。事实上，这些批评家之间的联系并不紧密，很多人并未明确表明自己属于文化唯物主义阵营，他们只是有着共同的批评对象——莎士比亚的戏剧，使用了相似的批评手法，如此而已。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目的，那就是在文本中寻找反抗的声音和颠覆的力量，批判以撒切尔为代表的右翼政府和当代资本主义。

文化唯物主义并没有发明一种开创性的理论，它只是将解构主义、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后殖民主义和同性恋等理论，融会贯通，为己所用。文化唯物主义各个批评家联系松散，所采用的理论也不都是原创。久而久之，就暴露出一些问题：有些派内批评家先是投身批评，随后转而批判文化唯物主义。再者，文化唯物主义难以在各种杂烩的理论中找到认同和归属，他们借用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各种理论，然而一些批评家指责文化唯物主义并没有真正参透其借用理论的内涵，只是使用了一些名词而已。

20世纪80年代末，这些问题最终爆发出来了。文化唯物主义派内主将之一凯瑟琳·贝尔西（Catherine Belsey）撰文，反对文化唯物主义，提出一种新的理论，名曰“文化历史”。自由人文主义者、女性主义批评家与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上展开论战。这是文化唯物主义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论争，也就是以这个时间段的论战为标志，文化唯物主义发生了理论转向。

一、与贝尔西的论战

这场论战发生在20世纪90年代前后，有着深厚的政治历史背景：文化唯物主义自提出伊始就有着明确的政治指向性——批判右翼势力，反对撒切尔政府，改造压迫的社会政治秩序。然而，历史证明，撒切尔政府的右翼统治并没有使英国陷入万劫不复的深渊，社会反而一时呈现出蒸蒸日上、欣欣向荣之貌；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话语虽能够纵论时政，指点江山，但是并未有任何现实效用；改变社会秩序的目标在短期内难以实现。文化唯物主义的发展遇到了瓶颈。这时，贝尔西心生异见，改弦更张，转而攻击文化唯物主义。多利莫尔和辛菲尔德坚持捍卫文化唯物主义的立场，相继撰文反击。

贝尔西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将之一^①，她长期执教于英国卡迪夫大学，著述丰富，是当代著名的批评家、理论家，在英国批评界具有一定的影响力。

1989年，贝尔西在《走向文化历史：理论与实践》（“Towards Cultural Histo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一文中提出“文化历史”这一概念，力图与文化唯物主义划清界限。

何为“文化历史”？贝尔西说：“‘文化历史’就是从日记、信件、自传等虚构作品中寻找意义和价值。”（Bokay et al, 1997）²⁴“文化历史”的主要批评对象就是虚构作品，贝尔西希望从其中探寻文化演变的历史轨迹，追踪形成今天人类社会价值和意义的源头。因此，“‘文化历史’的终极目的是追寻历史的真实意义，但是它呈现的不仅是记录各种行为的历史，而是关于确定意义、规约和真理话语的历史”（Belsey, 1989）¹⁶³。

“文化历史”主要从解构主义理论中汲取了思想养料。解构主义将真理视作确定意义、符号、价值和规范的霸权，认为真理规范了我们的语言，限制了我们的行为界限。解构主义批评家醉心于解构、拆分和去除中心。他们将真理的历史理解为服从的历史，认为解构真理就要打破中心、去除权威。同样，贝尔西的“文化历史”不满足于揭示真理，还致力于发掘历史上抗拒真理的力量。在这一点上，贝尔西认为，“文化历史”与新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极为类似。但是，二者的区别在于对反抗和斗争的解释。新历史主义认为权力无孔不入、无懈可击，它们无所不包地遏制一些力图推翻权威的力量。“‘文化历史’呈现的则是各种利益和矛盾冲突，是文本的不确定性，它与权力相关，但也关注抵抗和反叛的力量。”（Belsey, 1989）¹⁶⁴

贝尔西在阐释完“文化历史”的批评方法之后，也随即在文中展开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批判。贝尔西认为文化唯物主义“仅仅将激进的观点停留在想象阶段，并不能发挥其颠覆的效用……批评家可以更进一步，不单单传播理论，而将理论

① 贝尔西是文化唯物主义的主将之一，这一点是学界的共识，毋庸置疑。许多研究文化唯物主义的权威著作，都将贝尔西列为文化唯物主义的主要人物之一。例如，在《莎士比亚和文化唯物主义》（*Shakespeare and Cultural Materialist Theory*）中，克里斯托弗·马洛（Christopher Marlowe）认为贝尔西的批评是文化唯物主义的典型代表（Marlowe, 2017）。在《莎士比亚与当代理论》（*Shakespeare and Contemporary Theory*）中，尼玛·帕维尼（Neema Parvini）认为贝尔西也属于文化唯物主义一派（Parvini, 2012a）。帕维尼还将贝尔西列为文化唯物主义的重要人物（Parvini, 2012b）。约翰·布瑞尼根（John Brannigan）将贝尔西的《悲剧的主体》（*The Subject of Tragedy*）视作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代表著作（Brannigan, 1998）。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不一而足。

运用到拒绝权威或震慑权威上来”（Belsey, 1989）¹⁶⁵。

贝尔西强调“文化历史”与文化唯物主义的不同之处在于“实践”。文化唯物主义的激进主义只是纸上谈兵，她认为激进不仅是思想上的一种状态，而且必须付诸实践。借助解构主义，贝尔西利用历史中对权力的反抗，将文化历史应用到分析现代文化现象中去。既然理论能够挪用莎士比亚这一存在于文学历史中的人物，那也能够“将文化生产融入到英语课堂中去，将理论中的成果付诸实践”（Belsey, 1989）¹⁷⁰。

批评理论不只是探幽历史、反思过去的工具，而应成为当代文化中的重要一环，成为针砭时弊的武器。1986年，贝尔西尝试在加拿大的麦克马斯特大学开设“走向文化历史”这门课程。过程遭遇重重困难，许多学生对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和雅克·德里达（Jacques Derrida）的解构主义的概念十分陌生，一切都要从头谈起；贝尔西首先让学生们熟悉与解构主义相关的语言学理论，再着手文化历史的实践。按照上述计划，贝尔西提供了文艺复兴时期的画家汉斯·霍尔拜因（Hans Holbein）的名画《使者》（*The Ambassadors*）以及威廉·莎士比亚（William Shakespeare）的《哈姆莱特》（*Hamlet*）这两份材料。她希望学生根据以上两个文本，探讨人文主义、幻觉主义（illusionism）和暴力之间的关系（Belsey, 1989）¹⁶⁹。虽然贝尔西说自己的理论教学非常顺利，学生们也非常配合，但是结果却不甚理想。因为将理论付诸实践并非易事，不仅要求学生们对历史了如指掌，而且他们必须熟稔当代文化的现状。“我给学生们提供了不同时间阶段的家庭合影，试图从中读出父权关系的变化。然而这种解读略显简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将历史阶段与现代文化现象联系在一起。”（Belsey, 1989）¹⁶⁹因此，贝尔西的文化历史解读没有办法得出任何能颠覆权威的结论。虽然在推行文化历史的过程中困难颇多，但贝尔西认为，这并非是文化历史自身的问题，它的存在对英语学科和批评理论意义非凡，并且，推行文化历史批评并不是一蹴而就的。

贝尔西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批判遭到多利莫尔和辛菲尔德的反对。1990年，二人在杂志《文本实践》（*Textual Practice*）上撰文《文化与文本：为文化唯物主义正名》（“Culture and Textuality: 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回击。此文前半部分由多利莫尔撰写，回应贝尔西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指控；后半部分由辛菲尔德执笔，指出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在英语学科内的发展困境。

1. 将文化斗争视作统一连贯的现象。
2. 认为真正的斗争无处不在（除文本之外）——贝尔西称之为庸俗马克思主义。
3. 在理论中没有阐明

(a) 近年理论发展的态势；(b) 文本是不稳定的整体；(c) 文化是承认或者质疑规范、确认或者挑战知识以及分裂和产生个体的场域。(Dollimore et al, 1990)⁹²

对于贝尔西如是批评文化唯物主义以上“罪名”，多利莫尔认为是无中生有。他说文化唯物主义认为文化体现各类权力斗争，而且从未将文本视作是稳定的整体。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始终强调文本中存在异见的力量，非主流意识形态在否定、动摇着主流意识形态的中心地位。文化唯物主义自诞生起，就融合了女性主义、马克思主义等理论方法，之后又紧随时代潮流，关注后殖民和同性恋等话题。文化唯物主义对近年理论发展的趋势十分关注，是与时俱进的批评理论。多利莫尔认为贝尔西只不过是可悲地陷入了自己口中妄图抵制的“权力的深渊”——“攻击与自身相异的个体以获得‘意义、存在和效用’”(Dollimore et al, 1990)⁹²。

多氏拒绝承认贝尔西的指控，反而批评贝尔西批评方法中的几个逻辑漏洞。

其一，贝尔西对矛盾和冲突的理解过于简单。多氏反复强调文化历史就是要暴露历史中的矛盾和冲突，通过分析这些矛盾，找到变革社会的途径。多利莫尔认为社会形态可以依据瓦解自身的力量适当做出调整，并且矛盾和冲突并不一定是解放的力量，不一定起到革新的作用。例如，在当代社会中，家庭暴力反复出现，而且在媒体的渲染之下显得更加恐怖、邪恶。但是家庭的观念不仅毫发无损还有所加强。家庭暴力的存在并不会瓦解家庭观念，相反，它成为和谐家庭的新威胁。贝尔西没有认识到矛盾和冲突可能成为另一种压迫性的力量，将复杂的问题简单化。

其二，贝尔西对“抵抗的历史”的理解不甚明了。贝尔西借用福柯的理论，将历史理解成为“抵抗的历史——劣等诗人、傻瓜、罪犯和离经叛道之人抵抗权力予以其地位的历史”(Dollimore et al, 1990)⁹³，但是她在批评过程中却忽视了这些边缘群体。她只看到了历史的表象，没有探究它的深层内涵。贝尔西既然强调边缘群体的地位，就必须关注他们的历史。边缘群体不仅能够质疑权威的合法性，而且可以揭示社会主流意识形态对该群体的政治压迫。贝尔西对边缘群体的地位和历史只字未提，只强调抽象的“历史的真实意义”，无视历史的多元化。

在文章中的下篇，针对贝尔西在英语学科内推广文化历史的雄心壮志，辛菲

尔德也发表了看法。贝尔西意在说明在批评过程中不应该只看到文本中的断裂和冲突，而应让这些冲突成为变革社会的工具。然而，要在教学实践中推广文化历史并非易事。辛氏认为原因在于英国大学内部自由人文主义（liberal-humanist）批评的盛行。自由人文主义认为伟大的文学是一种永恒的真理，代表人类的普遍价值，并且不受社会历史、时代观念和语境的影响。自由人文主义批评的代表人物就是 F. R. 利维斯（F. R. Leavis），他们更关注文本的形式特征，重视文本的遣词造句、修辞手法，分析文本的语法结构等。这种批评方法在 20 世纪 70 年代之前盛行于英国文学教学当中，至今余韵未消。贝尔西的文化历史的目的就是要否定永恒真理和普遍价值，在历史和文化的参照之下解读文本，发现其中的矛盾和冲突，进而找到变革社会的力量。

事实上，辛菲尔德进一步解释说，自由人文主义批评带有唯心主义色彩。通常，在课堂上学生会根据手中的材料，探讨文本的语法特征或者讨论其中的道德价值。“这种远离历史和社会环境的阅读和写作时常发生。”（Belsey, 1989）⁹⁷ 不难想象，即使在分析文本过程中能够发掘出颠覆性的元素，也是脱离现实和政治的探讨，不具有任何现实意义。显然，自由人文主义与文化历史的初衷背道而驰，要想在自由人文主义横行的学科之内推广文化历史尤显艰难。

贝尔西认为，如果能够探究莎士比亚文本中的矛盾和冲突，何不古为今用，将其应用到分析现有文化现象中去呢？现实的情况并非理论家们叙述的那般简单，现实情况要复杂得多。辛菲尔德还是较为清醒的，他认为：“讲授莎士比亚戏剧并不会摧毁资本主义，但是最起码可以算得上一种文化上的干预。”（Dollimore et al, 1985）¹⁷⁸ 贝尔西片面曲解了福柯的理论，她声称的历史是“矛盾和利益交织的历史”，但是她自己语焉不详，不能说清楚到底何为“冲突的利益”。况且她口中声称文化是确认和质疑规范的场域，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这里的文化不仅仅指文本中的文化，而且涉及一系列的生产机构（例如监狱、医院和大学等）（Dollimore et al, 1985）⁹⁹。

文化历史自身的问题、大学内部自由人文主义的盛行等因素都是贝尔西推行文化历史的障碍。贝尔西也逐渐意识到要想将文化历史付诸实践，过程艰辛而又漫长。

笔者认为，贝尔西的“文化历史”的确存在许多问题。

第一，贝尔西对“实践”的理解略有偏差，她把“实践”理解为批评实践，将其仅仅局限在大学课堂之中，她希望学生在解读文本时参照文化和历史语境，

得出具有颠覆权威意义的结论，对整个西方文学理论体系产生深远的影响。然而，除非“文化历史”能够在大学英语课堂内部大面积推广，否则很难产生巨大的影响。而即使普及“文化历史”是可行的，推翻几百年来形成的认识和价值，的确需要假以时日。相对于文化唯物主义来说，“文化历史”的操作难度更胜一筹。实现文化历史批评，甚至可以说是天方夜谭。

第二，她对“真理”语焉不详。贝尔西称“真理”是形成话语和意义的来源，那么在文本中，在她所关注的虚构作品中，“真理”的表现形式是什么？她试图解构文化在历史上形成的价值和意义的权威，这些权威在文本中是如何体现的？在贝尔西所叙述的课堂实验中，她也没有讲清楚所反对的“真理”是何物，是自由人文主义还是父权制？如果说“文化历史”反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批评方法过于灵活，难以操作，那么贝尔西也依旧落此窠臼，没有摆脱文化唯物主义批评的弊端。

第三，贝尔西在批评中试图否认真理和话语的确定性，无非就是将解构主义应用到对历史文化的解读中。“解构实践也称为‘文本骚扰’，或者‘对抗性阅读’，其目的就是呈现文本内部的矛盾或者不连贯，呈现隐藏于连续的外表之下的不连续性。”（巴里，2014）解构主义打破中心，反对文本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寻找文本中的含混多义。这样看来，“文化历史”在文本中寻找文化中的不确定性，理论方法与解构主义无异，没有任何新意。

虽然文化唯物主义的确存在许多弊病，但是它至少解构了传统的莎评方法，批判了撒切尔执政时期莎士比亚教学和考试制度，在批评界掀起了一场波澜，对右翼势力起到了震慑作用。时至今日，文化唯物主义已经在莎评中居正统地位，在英国马克思主义批评史上也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而贝尔西的文化历史则籍籍无名，既没有在教学中广泛推广，也没有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只供教授和学者查阅。

自这次论战之后，贝尔西与文化唯物主义一派彻底决裂，她很少再为文化唯物主义发声。但是，她在后结构主义研究领域颇有造诣，出版了许多关于后结构主义的著作，包括《理论和实践中的莎士比亚》（*Shakespeare in Theory and Practice*）、《后结构主义导论》（*Poststructuralism: A Short Introduction*）等。时至今日，提到英国的后结构主义批评家，贝尔西的名字是不可忽略的。

二、来自列文的批评

在同一时期，文化唯物主义也面临着外部的质疑，自由人文主义者理查

德·列文^① (Richard Levin) 在《新文学史》(*New Literary History*)^② 上发文, 痛斥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时任主编科恩决意邀请诸位当事人, 撰文回应纷争, 并将所有文章都出版在 1990 年春季的第三期上。一时间, 各种声音迭出, 热闹非凡。

列文的文章《新历史主义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批评中不可思议的想象》(“Unthinkable Thought in the New Historicizing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③ 指出了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逻辑漏洞。他将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所反对的旧历史主义的批评方法称作“时代观念”(idea-of-the-time)的方法。列文认为, 旧历史主义者 E. M. 蒂利亚德 (E. M. Tillyard) 和丽莉·坎贝尔 (Lily Campell) 等人提出的秩序观念都可以在伊丽莎白时期的宗教手册、布道文书以及礼仪指南和庭审记录中找到相关证据, 这对于历史研究来说实证如铁, 不可推翻。而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则认为, 在波诡云谲、风云变幻的伊丽莎白时代的社会中不可能存在同质的思想观念, 他们仅仅依赖于“其他意识形态和话语会不断质疑主导意识形态”这一主观判断, 在历史材料中却没有找到任何实际意义的证据。“莎士比亚和其同时代的观众不会刻意谴责李尔王 (King Lear) 反抗‘存在之链’或者苔丝梦娜 (Desdemona) 违背父亲的旨意, 或者哈姆莱特 (Hamlet) 的复仇以及朱丽叶 (Juliet) 的自杀。”(Levin, 1990)⁴³⁴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无视时代观念和歷史史实, 用现代读者的观点解读了这些情节。

列文共发现了五点具体的文本证据, 最后一点是关于文化唯物主义的。其他四点都讨论的是新历史主义批评文本中的问题。这些错误总结起来, 可以归结为——时代误植, 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将现代社会的观点和看法强

① 2003 年, 列文出版了论文集《寻找论据: 莎士比亚及同时代作品批评方法批判》(*Looking for Argument: Critical Encounters with New Approaches to the Criticism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其中收录了列文对新兴莎评方法的批判, 包括女性主义、新历史主义、文化唯物主义、马克思主义以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等。论文集中也包含下文提到的《新历史主义对英国文艺复兴时期戏剧的批评中不可思议的想象》一文。

② 《新文学史》创刊于 1969 年, 其第一任主编即创刊人是弗吉尼亚大学的拉尔夫·科恩 (Ralph Cohen)。该杂志以开放性、多样性著称。该刊创刊伊始就鼓励将文学研究和历史、理论联结起来, 这在新批评独揽批评界天下的时代是十分难得的。平等、包容、多样是该杂志的办刊宗旨, 结果“来自不同理论背景、针锋相对的学者能够在《新文学史》上同台亮相, 各自言说, 平等交流与对话”(姚峰, 2011)。主编科恩甚至邀请同一期的各位作者, 要求他们阅读同期的每一篇文章, 可以自由地发表见解, 这也就出现了以下的现象: 批判文化唯物主义的与拥护文化唯物主义的文章同时登出, 各种观点齐聚一堂, 尽显各家风采。

③ 文中简称《不可思议的想象》。

加于 17 世纪的读者之上，他们从戏剧中得出貌似正确的论断，但缺乏可信性，没有真正的史实证据，甚至有些还犯有逻辑错误。例如多利莫尔强调伊丽莎白统治时期，正是个性的发现和连续身份（continuous identity）的觉醒时期。列文认为这在生活中不太现实，因为如果“根据他们的推断，过去人们的思想与现在的大不相同……好像人们都是从火星上来的一样”（Levin, 1990）⁴⁴³。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说的“连续身份”根本说不通，如果说之前人们不存在自我的概念，只有断裂的身份，那么文艺复兴时代的女性，早晨醒来应该发现自己和昨晚并不是同一个人；或者发现自己突然不认识家庭成员了……文化唯物主义的推测有违常理和经验（Levin, 1990）⁴⁴³。

列文将这些主观的推断称之为“不可思议的想象”（unthinkability）（Levin, 1990）⁴⁴⁴。这些论断缺乏深入的思考和合理的逻辑特征，一些批评家道听途说，不加思考地全面接受，或者在此基础上添加自己的解释，是完全站不住脚的。列文认为，如果要证明上述论断，就必须依赖史书或者自传。新历史主义和文化唯物主义的当下意识过分突出。他们出于某些政治目的而征引莎士比亚的戏剧，不惜曲解本意或者肆意添加主观因素。无论是女性主义的觉醒、性别身份的多变还是自我身份的连续性等等，都必须在历史中寻找能够为这些论点背书的佐证，而非通过逻辑推理和判断，得出貌似正确但是却不堪一击、毫无依据的说法。

科恩邀请文化唯物主义健将多利莫尔撰文回应列文的批评，然而多利莫尔拒绝应战。或许他认为列文的批评无须反驳，不攻自破。我们也许能够从辛菲尔德和多利莫尔的批评著作中找到拒绝的原因。

辛菲尔德在阅读《麦克白》（*Macbeth*）的时候，发现了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一种为绝对主义国家意识形态，维护君主专制的合法性；另一种是它的对立面：合法的君主也有可能成为破坏国家统治的暴君。他回到莎士比亚写作时期的历史中去，在苏格兰人乔治·布坎南（George Buchanan）所著的《苏格兰史》（*The History of Scotland*）中找到推翻合法君主和暴君二元对立的史料证据，以此来证明社会中不只存在一种绝对主义国家意识形态，还存在着否定它的声音。辛菲尔德在批评过程中征引史料，合理推断，结论具有说服力。

在论证文艺复兴时期的多重意识形态时，多利莫尔在《激进的悲剧》（*Radical Tragedy*）一书中有详细的叙述，而且有充分的文本证据。多氏认为，在 17 至 18 世纪一批哲学家和思想家的笔下，多重意识形态的思想和意识已经初露端倪，他们已经走在时代的前列。这些理论家包括弗朗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托马

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尼可罗·马基雅维利(Niccolo Machiavelli)和米歇尔·蒙田(Michel Montaigne)等。马基雅维利认为,宗教就是一种政治工具。蒙田解构了享有权威地位的法律的本质,冲击了社会中的主流意识形态,他认为法律只不过是一群无用之人利用权势制造出来的于己有利的规约:“法律之所以正确、公平,不是由于它本身的特质,而是因为它是法律。它们建立在权威的基础上;更可笑的是它们由一些憎恨公平的傻瓜所制定。没有比法律更加荒唐、厌恶之物了。”(Dollimore, 2010)这些理论家在不同程度上认识到了意识形态的政治功能,发出了与主流相异的声音。这些言论的存在为同时代的戏剧创作提供了思想源泉。多利莫尔征引繁复,史料充足。据此,他试图在悲剧中解构统治阶级的主导意识形态,发掘历史中反抗和颠覆的声音。

事实证明,大部分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在征引历史史实的时候,都引用了权威的历史证据。从上述批评的例证中,读者都可以发现真相。这或许是多利莫尔认为不必赘述理由反驳列文的主要原因之一。

三、来自女性主义的质疑

虽然多利莫尔拒绝回复列文的批评,但是他仍然接受了科恩的邀请,撰文在同一期杂志上发表了《莎士比亚、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人文主义》(“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Feminism and Marxist Humanism”),回应了女性主义批评家卡罗尔·尼利(Carol Neely)和琳达·布斯(Lynda Boose)的批判^①。

尼利和布斯主要的批评对象是凯瑟琳·麦克拉斯基^②(Kathleen McLuskie)和多利莫尔等文化唯物主义女性主义批评家。前两者主要认为,虽然文化唯物主义为女性发声,然而他们只是“将文艺复兴时期的社会重新建构成为一个充满着等级、专制、霸权并且不可推翻的世界”(Neely, 1988)¹²,并没有关注到女性解放

① 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主义与女性主义的关系一直不是十分融洽。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典型的“性别盲”,在批评中一般忽略性别问题(伊格尔顿,2019)²⁶。到了20世纪80年代,一批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开始为女性发声,然而,在女性主义批评家看来,这些批评的声音笨拙不堪、粗俗浅陋,完全没有达到彻底批判男性社会的目的——他们空有女性主义批评之名,而并无性别批判之实。女性主义批评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依旧疏远(伊格尔顿,2019)²⁸。

② 麦克拉斯基、多利莫尔以及下文出现的丽莎·贾汀(Lisa Jardine)都是文化唯物主义流派中女性主义的拥护者。文化唯物主义中为女性主义发声的批评家还包括克莱尔·麦克曼努斯(Clare Mmanus)和丁普娜·卡拉班(Dympna Callaghan)等人。

的声音。在《主体的建构：女性主义批评与新文艺复兴话语》（“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Feminist Practice and the New Renaissance Discourses”）一文中，尼利认为“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还是男性的批评——一群男性批评家在解构男性中心主义时，将男性置于中心地位，只是重复呈现女性的边缘地位”（Neely, 1988）⁹。在他们的批评中，女性依旧是“他者”，是被忽视的群体。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很少去关注女性的地位以及性态问题。布斯在《莎士比亚研究中的家庭，或莎士比亚研究者的家庭研究，或关于政治的政治》（“The Family in Shakespeare Studies; or—Studies in the Family of Shakespeareans; or—The Politics of Politics”）一文中称，文化唯物主义和新历史主义批评家倾向于用“家庭”的话题替代“性别”（Boose, 1987）⁷²³，这种替换抹去了女性的声音。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麦克拉斯基“将莎士比亚戏剧读者完全置于男性视角之下”（Boose, 1987）⁷²³，单纯揭示“莎士比亚与社会中的男权霸权合谋，不去展示剧中的厌女情绪和仇视女性的问题”（Boose, 1987）⁷²³，无视女性所受到的压迫。

尼利和布斯还批判称，许多文化唯物主义的著作很少收录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在《政治莎士比亚》所收录的十一篇文章中，只有两篇是关于女性主义的；《另读莎士比亚》（*Alternative Shakespeare*）的十篇中也只有两篇；《莎士比亚以及理论问题》（*Shakespeare and Questions of Theory*）收录了十六篇文章，只有四篇与女性主义有关^①。在尼利看来，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声称的关注边缘群体的地位和作用完全是空谈，因为他们的批评要么带有强烈的男权中心主义色彩，要么就

① 在《政治莎士比亚》中，关于女性主义的两篇论文分别是多利莫尔所写的《〈一报还一报〉中的僭越与监视》（“Transgression and Surveillance in *Measure for Measure*”）和麦克拉斯基的论文《父权制的剧作家：女性主义与莎士比亚：解析〈李尔王〉与〈一报还一报〉》（“The Patriarchal Bard: Feminist Criticism and Shakespeare: *King Lear* and *Measure for Measure*”）。《另读莎士比亚》一书中收录的两篇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分别是杰奎琳·罗丝（Jacqueline Rose）的《莎士比亚批评中的性态：〈哈姆莱特〉和〈一报还一报〉》（“Sexuality in the Reading of Shakespeare: *Hamlet* and *Measure for Measure*”）和贝尔西所著的《打破性别差异：喜剧中的意义与性别》（“Disrupting Sexual Difference: Meaning and Gender in the Comedies”）。《莎士比亚以及理论问题》收录的四篇女性主义论文包括：伊莱恩·肖瓦尔特（Elain Showalter）所著的《再现奥利菲娅：女性、疯癫以及女性主义批评的责任》（“Representing Ophelia: Women, Madness and the Responsibilities of Feminist Criticism”），以及来自南茜·维克斯（Nancy Vickers）的《绝色芳华：莎士比亚的〈鲁克丽丝受辱记〉》（“‘The Blazon of Sweet Beauty’s Best’: Shakespeare’s *Lucrece*”），乔纳森·哥德伯格（Jonathan Goldberg）的《莎士比亚的铭文：为权力发声》（“Shakespearean Inscriptions: The Voicing of Power”）以及乔伊·法恩曼（Joel Fineman）的《解读莎士比亚的〈驯悍记〉》（“The Turn of the Shrew”）。

是重复女性的边缘地位。多利莫尔仅仅对《一报还一报》(*Measure for Measure*)^①中“最受压迫的群体——妓女作了一些分析。但是由于她们沉默无声(无论在历史上还是文本中),批评家们也不能替她们抗辩,妓女、女性和性态问题一并也消失了”(Neely, 1988)¹⁰。

在回应两位女性主义批评家的论文中,多氏解释说,他在分析《一报还一报》时,试图展现的是社会危机如何在妓女的身上得以体现。表面上,妓女引诱人们纵欲,导致社会失序。但是实际上,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威将专制统治的腐败和无能转嫁到人们对性解放的追求上。妓女因此承担着道德的污名,在剧中被剥夺了发声的权利,但是这种沉默并非意味着女性声音在文本中的消失。她们的沉默恰好反映出社会的压榨和男权意识形态的强大(Dollimore, 1985)。对于妓女来说,她们是异性恋社会中男性经济的牺牲品,她们对现存意识形态的压迫无能为力,最终成为社会失序、道德堕落的替罪羔羊。

多氏指出,导致女性主义批评家对文化唯物主义的误解的因素有很多,包括“表达方式、历史地位、文本之间的关系,以及再现被历史边缘群体的可能性和理解性别的不同方式”(Dollimore, 1990)⁴⁷⁶。文化唯物主义的确探讨了女性的边缘地位,只是表达方式与女性主义批评家不同。文化唯物主义批评家并没有与男性霸权共谋,在话语上延续对女性的压迫。他们将女性与其他社会边缘群体结合在一起,揭示主流话语对她们的压迫。贾汀和麦克拉斯基认为“虽然伊丽莎白和詹姆斯一世时期并没有直接反映女性意识的觉醒,但是‘男性霸权对社会遽然变化产生的焦虑足以从侧面说明这一问题’”(Dollimore, 1990)⁴⁷⁴。多利莫尔对莎剧《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The Tragedy of Antony and Cleopatra*)的批评,就从这个侧面说明了女性意识的崛起。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是莎士比亚著名的悲剧。在剧中,马克·安东尼(Mark Antony)与盖维斯·屋大维(Gaius Octavian)、M.埃米利乌斯·雷必达(M. Aemilius Lepidus)同为罗马“三巨头”,但安东尼沉溺美色,拜倒在埃及女王克莉奥佩特拉(Cleopatra)的石榴裙之下。罗马帝国受到塞克斯都·庞培

①《一报还一报》的主要内容是,在维也纳城邦,克劳迪奥(Claudio)因为与未婚妻朱丽叶(Juliet)发生关系,致其怀孕,而被代管城邦的安吉鲁(Angelo)处死。克劳迪奥的姐姐伊莎贝拉(Isabella)向安吉鲁求情,却被要挟用贞操换取弟弟的性命。本来要外出的公爵,装扮成神父,为伊莎贝拉出谋划策:要伊莎贝拉假意同意安吉鲁的要求,公爵让安吉鲁被抛弃的未婚妻玛丽安娜(Mariana)替代伊莎贝拉前去赴约。最后克劳迪奥得救。在此部剧中,妓女并不是主角,她们的行为是通过他人之口说出的,因此,她们处于“失声”状态。

(Sextus Pompeius) 叛乱的威胁，三巨头不得不再次结盟。此时正值安东尼的妻子富尔维娅 (Fulvia) 去世。为巩固与屋大维的关系，安东尼娶屋大维之姊屋大维娅 (Octavia) 为妻。在交战前夕，安东尼和屋大维、庞培达成了和解。不久之后，安东尼听闻屋大维撕毁三巨头盟约，背弃了雷必达，便向屋大维宣战。安东尼将屋大维娅遣返之后，与克莉奥佩特拉一起在亚历山大加冕称王。消息一传到罗马，屋大维随即攻打埃及。在海战中，克莉奥佩特拉的战船掉头逃遁，安东尼不顾战局，追随之而去，埃及军队大败。随后，屋大维与克莉奥佩特拉签订密约，安东尼的爱将多米提乌斯·艾诺巴勃斯 (Domitius Enobarbus) 也投降屋大维。盛怒之下，安东尼痛斥克莉奥佩特拉背叛自己。因惧怕安东尼的暴怒，克莉奥佩特拉躲进坟墓，谎称自己在悔恨中死去。安东尼万念俱灰，以身殉情。克莉奥佩特拉因不愿做屋大维的俘虏，也自杀身死。

《安东尼与克莉奥佩特拉》中展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性爱与权力之间的关系。剧中，安东尼的爱情和婚姻从来没有超越权力，一直都是现实政治斗争的工具。安东尼与三位妻子的结合都带有强烈的政治意义，他们之间也存在着权力的斗争。

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力的角逐在着装方面体现出来。多氏认为，着装不仅表达了传统秩序，而且是上帝区别两性特征的最基本的反映。“在悲剧中，社会的风云变迁、强烈的认同焦虑以及等级秩序的摇摇欲坠都在僭越着装传统的行为中表达出来，尤其是女性穿着男性的服装。” (Dollimore, 1990)⁴⁸³ 异装 (cross-dressing) 被女性用来表达对她们低下社会地位的抗议。一言以蔽之，异装行为代表僭越传统，代表女性在主流意识形态的主导和压迫之下发出的反抗之言。

女性只有在穿着男性服装时，才能够获取与男性的平等地位。克莉奥佩特拉回忆起自己曾经身着男性服装，手执安东尼的宝剑，“那时候呀？往事不堪回首啊！ / ……九点钟前我就把他灌醉上床 / 给他戴上我的头饰，穿上我的长袍 / 我呢，给自己佩戴起他那柄菲利普皮宝剑。” (莎士比亚, 2016)⁵⁹ 克莉奥佩特拉手执宝剑，与安东尼互换服装，这一行为暗示出两者男女性别角色的转换。安东尼年事已高，男性权威摇摇欲坠，但是他还妄图证明自己依旧是那个征战沙场的骁勇战士。“虽然我壮年的棕发已露出一缕缕灰白 / 但我有一颗滋养着我的精力的雄心，即便 / 跟年轻人较量也丝毫不落下风。” (莎士比亚, 2016)¹³² 与恺撒开战之前，他不止一次地提到恺撒年轻气盛，“告诉他，他正值 / 风华正茂之年 / 该让世人看看……” (莎士比亚, 2016)¹⁰⁹。不难推断，安东尼意识到自己已经年老体衰，无法与年轻人相抗衡。与安东尼衰微的男性权威相呼应的是风云突变的外部世界，詹姆斯一世时期的战争情结和荣誉观念逐渐减弱。文本的历史语境也在暗

示着男性权威的变化。

克莉奥佩特拉做梦，梦到一位皇帝安东尼：“他又开双腿横跨大洋，他高举手臂冠顶大地；/他声出似天籁，用这天体和鸣般的美妙天乐/跟朋友轻声漫语；可当他震怒发威、/震颤大地时，他就像隆隆的雷鸣。”（莎士比亚，2016）¹⁶¹虽然安东尼的男性权威不断衰落，但是多氏认为，在梦中安东尼的男性形象也是克莉奥佩特拉所追求的。安东尼的男性权威引诱了克莉奥佩特拉，唤起了她心中对权力的渴望。

当信差来报安东尼已经与屋大维娅结婚时，克莉奥佩特拉反复对信差说：“赏你一大笔财产”，目的是希望信差改口，只带来好消息。多氏认为，克莉奥佩特拉贿赂信差就是要改变历史，按照自己的想法设计历史。传统道德要求女性贤惠和服从的品质在克莉奥佩特拉身上荡然无存，她希望与安东尼结合，不惜袒露自己的欲望，希望凭借金钱改变历史。

安东尼死后，克莉奥佩特拉战败，要成为恺撒的俘虏。恺撒好言相劝：“我对你极其仁慈的，如果你肯服从/我的安排，你就会发现自己其实是/因祸得福……”（莎士比亚，2016）¹⁶³但是，克莉奥佩特拉认为恺撒对她的征服就是对她的侮辱，她说：“克莉奥佩特拉将变身尖嗓子的童孩/威严的女王将成为卖弄风骚的妓娼。”（莎士比亚，2016）¹⁶⁷她不满男性权威的专横跋扈，不愿沦为恺撒的玩物，最后自杀殉情。

克莉奥佩特拉颠覆了传统的道德和浪漫的爱情观念，她和安东尼的结合完全是权术的产物。两人的爱情之中呈现的是男性和女性之间权力的角力。在剧中，安东尼的男性权威逐渐衰微，与之形成对比的是克莉奥佩特拉日益强大的野心。在边缘地位的掩盖之下，女性的自主意识觉醒，开始掌握自己的命运。

虽然多利莫尔没有谈论尼利所说的“身份、主体性、女性颠覆和反抗权威的可能”种种方面，但同样展现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和对男性权威的挑战。文化唯物主义另外一员主将辛菲尔德在批评中也没有直接强调女性的地位，只是从侧面衬托出男权意识形态的强大，他在很多文章中^①都提及女性在社会中所受到的压迫以及女性的反抗。文化唯物主义为边缘群体发声，着力于改善他们在历史现实中被边缘化的状态。然而，边缘群体并非只包括女性群体，还囊括了社会中各色群体，

① 辛菲尔德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主要包括《什么时候角色不再是角色？苔丝德梦娜、奥利维拉、麦克白夫人和主体性》（“When Is a Character Not a Character? Desdemona, Olivia, Lady Macbeth and Subjectivity”）、《文化唯物主义：〈奥赛罗〉和政治可信性》（“Cultural Materialism, *Othello* and Politics of Plausibility”）等等。

例如少数族裔、同性恋以及在社会中的底层阶级等等。这样看来，上述文化唯物主义论文集收录的关于女性主义的论文，数目相对合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尼利等女性主义批评家对文化唯物主义的指控是站不住脚的。

文化唯物主义者对女性群体的关注，蕴含在他们对文本的文化内涵和社会历史的分析和解释中。如果在批评中，孤立地坦露女性的悲戚地位和命运，这种陈词滥调难以激起读者的共鸣和同情，而且无法彰显文化唯物主义的治学脉络。文化唯物主义并没有无视女性这一弱势群体，而是将女性地位与意识形态、族裔、性态等因素结合在一起，在历史和社会的背景之下，共同揭示弱势群体的反抗。

贝尔西曾经身为文化唯物主义的力将，她从撰文支持到高呼反对，这使得文化唯物主义失色不少。内部分歧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文化唯物主义的力量。然而，文化唯物主义外部论争也明确了批评的目标、手法和原则，提高了流派在学界的影响力。不可否认的是，以 20 世纪 90 年代论战的时间点为标志，文化唯物主义自身面临着巨大的转折。在此之后不久，主将多利莫尔和辛菲尔德的研究方向也由传统的莎士比亚研究，转向同性恋研究，二人在之后的著作中较少问津女性主义、后殖民等理论。由于同性恋研究范围较窄，后继无人，追随者愈来愈少，文化唯物主义不复当年的盛气。

参考文献【Work Cited】

- BELSEY C, 1989. Towards cultural history: in theory and practice [J]. *Textual practice* 3(2), 159-172.
- BOKAY A, BELSEY C, 1997. A talk with Catherine Belsey [J]. *Journal of English and American studies*, 3(1): 19-27.
- BOOSE L, 1987. The Family of Shakespeare studies; or—studies in the family of Shakespeareans; or—the politics of politics [J]. *Renaissance quarterly*, 40(4): 707-742.
- BRANNIGAN J, 1998.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M]. London: Macmillan: 105.
- DOLLIMORE J, 1985. Transgression and surveillance in *Measure for Measure* [M]//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Eds. Jonathan Dollimore and Alan Sinfield. Oxford: Manchester UP: 85.
- DOLLIMORE J, 1990. Shakespeare, cultural materialism, feminism and Marxist humanism [J]. *New literary history*: 471-493.
- DOLLIMORE J, 2010. *Radical tragedy: religion, ideology and power in the drama of Shakespeare and his contemporaries* [M]. London: Palgrave Macmillan: 15.

- DOLLIMORE J, SINFIELD A, 1985. Eds. *Political Shakespeare: new essays in cultural materialism* [M]. Oxford: Manchester UP.
- DOLLIMORE J, SINFIELD A, 1990. *Culture and textuality: debating cultural materialism* [J]. *Textual practice*, 4(1): 90-100.
- LEVIN R, 1990. *Unthinkable thoughts in the new historicizing of English renaissance drama* [J]. *New literary history*, 21(3): 433-447.
- MARLOW C, 2017. *Shakespeare and cultural materialist theory* [M]. London and New York: Bloomsbury Arden Shakespeare: 5.
- NEELY T, 1988. *Constructing the subject: feminist practice and the new renaissance discourses* [J]. *English literary renaissance*, 18(1): 5-18.
- PARVINI N, 2012a. *Shakespeare and contemporary theory: new historicism and cultural materialism* [M]. London, New Delhi, New York, Sydney: Bloomsbury: 122.
- PARVINI N, 2012b. *Shakespeare's history plays* [M]. Edinburgh: Edinburgh UP: 4.
- 巴里, 2014. *理论入门: 文学与文化理论导论* [M]. 杨建国, 译. 南京: 南京大学出版社: 69.
- 莎士比亚, 2016. *安东尼奥与克莉奥佩特拉* [M]. 罗选民, 译. 北京: 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姚峰, 2011. *《新文学史》: 一份理论刊物的四十年* [J]. *读书*, (2): 156-164.
- 伊格尔顿, 2019. *勃朗特姐妹: 权力的神话* [M]. 高晓玲, 译. 北京: 中信出版集团.